

結論

本文試圖對台灣原住民社會變遷的討論做出貢獻，針對居住於台東平原上的馬蘭社阿美族相關文獻資料提出詮釋，因此民族誌的描述不是本文的主要重點。書寫脈絡以台東平原阿美族獨特性為論述主軸，問題發想實源自現今田野的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我自身的農家經驗十分雷同，源於此困惑遂開啓對本論文的書寫，企圖從檔案、調查、遊記或口述等多方資料，除找出歷史對當代影響的可能解釋，並可進一步延續對當代的觀察。

正如以上各章所闡明的，台東平原馬蘭社阿美族人，在台灣殖民地經濟遭受日本帝國的統治之後，發生很大的變化，現代製糖產業的勃興，也使得台東平原的經濟發展被牢牢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一環，也使得殖民地化的程度越益加深。一方面造成台東平原農業作物上結構性的變化，也突顯馬蘭社阿美族人在稻米生產上的特殊角色；另從民族互動變化來看，移民進入的競爭力，與彼此間（阿美族、本島人、內地人）在土地利益上的競逐，可看出馬蘭社阿美族對日人「殖產興業」的良好適應能力，也顯示所謂「蕃人」的經濟概念並非以「原始經濟」即可解釋，他們對經濟生活的適應其實也是整個歷史變遷的一環，以經驗的累積主動或被動的回應外在的生存環境。

台東平原地區阿美族相較其他原住民在經濟適應上的特殊性，成為本論文主要探討的主軸。下述檢視緒論提出三個問題，並提出回應：

- (一) 從人、地、文化等範疇，觀察台東平原馬蘭社的阿美族，在歷史脈絡的獨特性？與其他族群的關係？
- (二) 在政治、經濟的脈絡下，以特定的產業發展（糖業與鳳梨事業），討論馬

蘭社阿美族人參與不同規模（國內、區域、部落）政治、經濟活動所扮演的角色？

（三）提出對經濟發展的反思？部落社會的生存模式是否真的是不適應的生存方式？不斷朝現代前進，是否對民族的生存更為有利？擁有富裕生活的底層，存在著怎樣的文化衝突與矛盾？

馬蘭社阿美族獨特性的設定，並非來自空泛的猜測，主要是源自我對文獻的理解。以比較的方法（阿美族「農業民族」與卑南族「武族」特性），成為論述過程中不斷回應或凝視的焦點，甚至預測該民族可能採取的選擇（保守？或積極？）或歷史發展的背後動力。隨著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開始，受到外來資本或武力的作用，台灣原住民社會已不能獨立於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不獨是經濟性的，還會是社會文化性的。台東平原馬蘭社阿美族在荷蘭時期因東印度公司的介入，卑南族確認並鞏固其在「後山」的勢力，阿美族則因課徵稻米稅，而逐漸加強其農業生產的傾向，馬蘭社重農的事實在日治時期資料裡經常可見，也成為南部阿美族與北部阿美族最重要的差異之一。

這樣的差異在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伴隨日本殖民征服帶來的現代國家概念。社會秩序不再是以家庭、親屬地緣關係為中心，進入更大行政系統的管理，經濟離開自給自足的形式，人主動或被動參與更大經濟體系中，在日本殖民政府「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資源開發下，台灣的經濟生產成為日本國內的主要供給來源，台灣作物發展成為以米、糖為中心的經濟型態。隨著糖業的發展與政治因素，外來移民在日治中期開始大量進入台東平原，其生活多半依附在糖業生產的經濟體系裡。阿美族在日本經濟開發的角色裡，除是主要勞動力來源外，源於其對農耕活動的熟悉，終而成為台東平原重要的稻米供應者，馬蘭社則是當時台東廳最富裕的部落。日本政府設定的「殖產興業」目標，支持了阿美族的農耕經驗，但對卑南族則設法多方瓦解其「武族」的性格，造成兩民族後續不同的民族

發展方向：卑南族統治勢力雖已逐漸消失，然而該民族歷史所習得的經驗，依然有效提供某種動力，使得卑南族人能快速適應環境，透過教育管道，讓自身再度流動至上層階層。過往直接受其保護之馬蘭社阿美族人，則依然透過農耕維持過往的生活形態，穩固其保守、重農的形象，因相當符合日本政策所需，在文獻資料屢屢可見稱讚阿美族為最優秀「蕃人」的紀錄。

部落社會的生存模式是否真的不適應現代化的生活？就此前提：從馬蘭社歷史過程來看，這個答案是否定的，也打破過往對台灣原住民歷史討論中不斷被強調的「經濟剝削」觀點——部落社會是有主動生存與適應能力的。如同 Karl Polanyi 對十九世紀後半的印度為例——從經濟指標來看，當時的工人階級不但沒有被剝削，反而在經濟上獲利，但是印度村落卻依然被摧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勞動與土地之市場組織打破舊有的村落社會所引起。如同戰後西方經濟史學家 Ramon H. Myers 將台灣「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的遠因，放在日本對台灣殖民地成功的治理的經驗裡。但是回到緒論的提問：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否對民族生存更為有利？將豐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化約成單一經濟面向的觀察是否無法質疑。對發展主義的批判並非創見，對「現代化」或「工業化」代表進步的質疑，源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反省，雖然馬克思主義提出剝削與勞動異化等精闢的觀點，但並未否定「經濟」的重要性。但經濟絕非維繫一個民族生存的唯一「選項」，Karl Polanyi 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說明：「社會災難主要是在文化上的，而不是可以用歲計收入或人口統計來加以衡量。」

這樣的觀察其實正呼應馬蘭社阿美族人的歷史經驗，資本主義所帶進的貨幣現金，造成部落政治權力的鬆動，精神上的空虛與壓力，也使得過去有紀律的飲酒習慣鬆綁而出現酗酒現象。傳統阿美族的信仰在無法解決部落人心靈需要的情況下，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落後」文化對生活的不利，於是企圖學習其他文明人的生活、文化，以改善自己的命運。阿美族學習漢人生活的現象快速擴散至日

常生活各方面。「進步」的想像，或對「文明」的渴望，開始對自身文化認同出現變化：他們已不全然是被統治階級，透過教育或擔任公職，他們也成為統治者的助力，在「文明化」的過程裡——擺盪在「抵抗者」與「協助者」的角色間。

整體而言，台東平原馬蘭社阿美族深受漢人影響，使得傳統風俗潛藏入深沉的文化脈絡裡，馬蘭社阿美族人「本島人化」或「變成日本人」的現象捲進歷史變動中，持續在現在的時空發酵。也因此現在去台東平原阿美族部落時，會感覺他們受到漢人宗教的影響很大，不僅普遍接受風水之說，還會在家裡廳堂擺設漢式神龕或香爐祭祖，甚至還有屬於自身的廟宇。這些現象都必須在歷史的脈絡裡才能找到答案。雖然深入瞭解後會發現——其傳統的宗教儀式與概念仍然存在。但是也顯示民族發展過程的複雜，無法僅從經濟的角度瞭解，文化的接觸與國家力量的介入都是不可忽視的。

日本殖民對台灣的影響如緒論所提，可以從四方面的統合來看：經濟的統合（交通網、土地制度、租稅、貨幣—度量衡的統一、市場）、國家的統合（憲法、國民議會、政府—地方自治體、裁判所、警察—刑務所、軍隊）、國民統合（戶籍—家族、學校、教會、博物館、新聞）、文化統合（國旗、國歌、國語、文學、藝術）。本論文雖未能全面涵蓋但也都涉及，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依照人類學進化論的觀點，被區分成「生蕃」、「化蕃」、「熟蕃」，再依文明程度，逐步將部分地區納入「普通行政區」；如此造成當時原住民有一部份居住「蕃地」，一部份居住「行政區」，居住「蕃地」與「行政區」的原住民分別採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大正 3 年（1914）開始日本即對居住平地之阿美族課徵地稅，將該區視同普通行政區，並從大正 5 年度起開始分三期施行東台灣土地台帳未登錄地調查，以確認其所有權。因此台東平原馬蘭社阿美族與居住在「蕃地」原住民不同，他們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且在大正 12 年（1923）實施民法、商法以後，原住民土

地登記時，即無須至所轄廳長處蓋章，可依其意願自由買賣土地。如此殊異於「蕃地」原住民的行政治理也是本論文另一關懷的重點。第三章曾提及政治現代化最關鍵的內容有：（一）政治現代化涉及到權威合理化，並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等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二）政治現代化包括劃分新的政治職能並創制專業化的結構來執行這些職能。（三）政治現代化意味著增加社會上所有集團參政的程度。特別是第三點，本論文討論阿美族人在當時選舉的角色，「具有選舉權」也是來源自殊異「蕃地」的行政治理。

此外，本論文也在歷史討論裡，反覆聚焦於阿美族社會文化特性的影響。就第三章大正 3 年（1914）所調查繼承權與土地相關的舊慣顯示：農耕為主的馬蘭社，有穩固的大家族生活形態，內部重視穩定與合作；卑南族為「武族」，較注重個人表現，在社會生活上慣於競爭而有階級差等，因此貧富差距較大。馬蘭社發達的土地私有觀念，配合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不僅穩固其固有的農耕方式，也有利日治時期所大力推動的定耕生產。甚至在出役制度造成家庭農業勞動人口變少的情況下，為求維持傳統耕作習慣與農業收穫，反而變相強化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國家政策與民族社會文化的複雜關係由此可見。同時，阿美族「女性繼承」制度也造成對阿美族選舉參與的重大影響。當時規定必須有固定財產且年齡足夠的男性戶主才擁有投票權，因此社會文化慣以女性為戶主阿美族，因此多半不具有公民權，而使得擁有選舉權的比率非常低，以當時新港郡長濱庄為例，高砂族人口數有 3595 人，但名簿登載有資格的選舉人卻只有 3 人，強烈影響阿美族當時政治參與的可能性。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捲入「西化」運動中，對當時的日本來說，如不在台灣實施所謂「文明化」的建設，台灣將會成為日本與外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障礙，這種渴望最後化約成「日本化」的問題，日本成為「殖民地」的現代標竿。在以日

本國家力量強力介入的「蕃社改善計畫」，強制在阿美族部落實施生活的改造：如強制實施公墓，讓本來得以保護家庭的祖靈成爲阿美族懼怕的惡鬼，讓阿美族因畏懼害怕而不敢至公墓祭拜，或限制釀酒讓完整的酒文化逐漸消失。「文明」、「進步」的「現代化」觀念，因此在心理層面上開始改變部分受現代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也就是說，這些受現代教育影響的原住民，主動或被動地抽離原有的價值觀念，部落原有的世俗或宗教領袖受到公職人員，和學校教師這些原住民菁英份子的挑戰，在尋求與新環境結合的同時，造成既有價值觀逐步受到侵蝕。如中村勝（2003）對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國民統合」過程的討論：其物質面向雖朝向近現代方向發展，卻造成精神上的不安定。

日治時期台東平原阿美族受到糖業經濟發展的影響，生活雖日益富裕，但固有的社會文化生活方式在主動或被動的因素下逐漸轉變。戰後隨日人離去，解除漢人不能進入原住民部落的限制，在台灣經濟環境對農業生活的衝擊下，台東平原阿美族人的生活出現迅速且劇烈的變化，馬蘭部落是台東市區內顯著都市化的地區，原範圍內的阿美族則大量移出馬蘭部落，另外遷移至台東市近郊（或牽移至台灣其他的都市地方），形成許多「分家部落」。復以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業生產轉向工商業），使不少台東平原的阿美族人也開始往都市移動，過去農耕的經濟型態，僅由 5、60 歲以上的老人堅守著。*sfi* 也在戰後逐一被變賣，其影響不僅是失去一個集會場所，也使部落傳承出現危機，更進一步影響整個部落的運作與凝聚。過去阿美族最重要的「母系社會」特質，現在部落裡五十歲以上的男子幾乎全部出贅並從妻居，但是 30 至 40 歲左右的男子卻全部轉變成嫁娶婚，僅僅一個世代就反轉長期的家庭社會型態，戰後的阿美族面臨比日治時期更嚴峻的生活衝擊。

日治時期欲排除「本島人」勢力，拉攏原住民的政策，因政權更迭，在日治時期已逐漸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阿美族人，戰後再度被拉在「文明天平」

的「野蠻」一端。相較於日治時期一直被認定為「野蠻人」的「蕃地」原住民，居住「普通行政區」的原住民在歷史過程面臨更多重的轉折。就許木柱（1997）民國 60 年代對平地原住民經濟調查的結果——強固的農業傳統與勤耕的民族特性，使得當時阿美族在經濟面向尚有不少的表現，但隨著社會文化快速消失，他們不僅難以適應外在大社會，甚至在心理上也產生「認同的污名」。

台東平原馬蘭部落的阿美族，在經濟、社會結構變遷下，部落面臨家庭制度的變化、會所功能的失去、年齡階層的不受肯定，復以商品經濟的擴張，使得遠離部落的原住民內心受到兩方面壓力的牽扯：一方面是該如何積極的投入外界變遷的主流社會，並與其他民族共同生存、競爭。另一方面當努力適應大社會的同時，也可能失去文化、語言的困境。讓我更深刻瞭解——一個民族的瓦解經常不是經濟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化的問題，失去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將造成一個民族失去方向與生存所依。

承上，在緒論所提的問題，本論文多半已經給予答案。也努力做到結合大的國家社會與小的部落，並透過時間縱深與地方的政治、經濟變化來討論台東平原馬蘭社阿美族的民族發展，與卑南族的互動關係。在論述對話上也試圖回應經濟發展與社會文化的關聯。面對本論文在緒論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提的問題——發展是什麼發展？是誰或什麼實際上得到發展？謀求發展的背後是什麼需求？這樣的發展如何才能實現？這些疑問包含了什麼政治意涵？我的回答是——發展僅是經濟意義上的發展，有時甚至只是經濟指標上的發展，阿美族在整體社會經濟成長的需求裡，並未謀求到自身民族的生存與延續，他們面對的是文化與語言的不斷失去，還有對自身的認同。因此唯有尊重不同民族社會文化的多元性，經濟的發展才有意義。